文

聂文郁 译注
刘仁清 审阅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三曹诗选译

三曹诗选译

殷义祥译注
刘仁清审阅

一九八九年·成都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秦伏男
封面设计：戴　卫
技术设计：盛寄萍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三曹诗选译　　殷义祥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0　插页4　字数159千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70册

ISBN7—80523—142—7/I·6　定价：2.88元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篇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一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一

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表现出与以前文学截然不同的崭新特点和面貌，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文学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

建安(公元196——220)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但史学上所称的建安时期往往超出这二十五年，大体上还包括三国初期的一段时间。这一时期，天下大乱，兵连祸结，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急剧的变化和发展。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

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农民大起义失败以后，在农民起义的血泊中崛起的大小封建军阀，纷纷拥兵自重，在东汉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许多封建割据势力。他们观兵问鼎，互相混战。在这场大混战中，曹操对现实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实行了一些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开明措施，政治军事实力发展很快。他相继灭掉了吕布、张绣、袁绍等，逐步统一了中原广大地区，安定了北方的政治局面，成了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自立，接着，孙权、刘备也相继在江南、西南建国称号，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的局面。

这几十年的军阀混战，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的大破坏，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地区出现了“人相食啖，白骨盈积”、“千里无烟，遗民困苦”的凄惨景象。曹操一次带兵路过家乡谯地，发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三国志·武帝纪》）。这种景象直到魏明帝时还未能恢复过来。魏明帝太子舍人张茂在上书中曾说：“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

略》）。可见这场惨祸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社会的巨大变动，引起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化。自汉武帝以来一直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思想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儒学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一般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的支配控制下挣脱出来，开始从其它学派中寻找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所以，在这一时期，名、法、道等家思想都有新的发展，外来的佛教也日趋兴起，整个思想界非常活跃。伴随着这种哲学的解放和人的觉醒，艺术创造也进入一个新时期。这就是包括三曹在内的建安作家生活与创作的"建安文学"时期。

建安文学一般是指建安时代的北方文学，其作家基本集中在曹氏父子周围。这些作家都亲身经历了汉末大乱，饱受战乱之苦，接触到广泛的社会现实，对战乱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很深的感触和同情；同时，他们都有一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政治上支持拥护曹操，希望借助曹操的力量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因此，描写那个时代的动乱现实，歌唱建功立业、拯世济物的雄心抱负成了他们诗歌中的重要主题。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了许多反映社会丧乱和民生疾苦，表现他们理想壮志的诗篇。这些诗篇不仅对当时社会现实有着真实深刻的反映，富有时

代气息，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诗歌创作上，他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表现出一种刚健有力、慷慨悲凉之风；而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诚如前人所言：“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这里说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就是钟嵘《诗品》中所说的“建安风力”，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建安风骨”。这种建安诗人共有的显著特色，是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在建安作家群中，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最负盛名，而曹氏父子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和建安文学实绩的体现者。他们的诗歌最鲜明地体现了建安文学的精神和风貌，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文坛“彬彬大盛”、创作空前繁荣的时代风貌。

二

曹操（公元155——220），字孟德，沛国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今安徽亳县）人。他是东汉末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文学家。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为开一代诗风做出了巨大贡献。《文心雕龙·时序》篇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在群雄逐鹿、戎马倥偬中，他不仅把大批文人学士集中在自己手下，倡导和鼓励他们创作，形成了一个“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的邺下文学集团，而且自己也创作了许多内容深刻、富有时代特点的优秀诗篇，为“建安文学”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建安一代的新诗风。

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诗歌，现存二十余篇，全部是袭用旧题的乐府歌辞。史家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他的这些乐府诗，不是单纯地模拟乐府的形式，更不是袭用古题古意，而主要是吸收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用旧题写新辞，反映新的内容，表现新的精神。如他的《蒿里行》，就概括了袁绍、袁术等军阀假借讨伐董卓的名义，各怀异心、争权夺利、互相混战的史实，突出地描写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惨象，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悲愤感情。诗人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

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往昔一派繁盛的中原地区，由于军阀混战，竟变成了人烟绝迹、鸡犬不闻、白骨盈野的荒凉之地。这种对社会残破景象的真实描写，是当时历史的真实纪录。与此篇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的《薤露行》，也是如此。诗人以沉痛愤慨之笔，叙写了何进误国、董卓焚烧洛阳、挟帝胁民西迁长安的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政治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可说是《蒿里行》的姊妹篇。这两首诗都是以挽歌写当时重大历史事实的，它们通过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切概括描写，表现了作者悯时伤乱的感情。

曹操是带兵打仗的军事统帅，他对战争生活有着切身体验。他的《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反映了军旅生活的痛苦。前者是记述他北征高干时的行军生活。诗中着力描写山路诘屈，人马同饥；北风悲凉，雪落霏霏的艰苦行军，寄托“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的悲慨；后者写久战在外的广大将士的怀乡之情，用比兴手法，表现长年征伐、转战四方的征夫“马不解鞍”、“甲不离傍”的苦况，透露出诗人既同情将士、又志在“靖难”、“图雄”的复杂情感。

曹操诗歌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直接披露个人情

怀，表现其统一天下的壮志雄心和进取精神。例如，他的《短歌行》细致曲折地表达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平定天下的壮志。开头八句以悲凉的调子唱出了积久的忧思和苦闷，抒发人生短促的感叹。然而诗人的苦闷和忧思，主要是由于统一天下的壮志未酬。因此，诗中着力抒写了对贤才的渴望和平定天下的决心。字里行间，激荡着一股雄壮之气，充分显示了曹操悲凉沉雄的诗风。这种诗风，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反映。

《龟虽寿》是《步出夏门行》的一章。全诗通过几个正、反的比喻，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充满着启人的深刻哲理。特别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显示了志士不甘衰老、老当益壮的奋发气概，读后令人振奋不已。曹操写这首诗的时候，已年过五十，诗里的这番话正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诗人的积极进取精神的自我写照。此外，作为一首较完整的写景诗，《观沧海》章浓墨重彩描绘了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辽阔雄壮气派。“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的描写，是古代诗人表现博大境界的杰出诗章。

曹操是开一代诗风的人。他汲取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用乐府题目自

作诗”，“叙汉末时事”，对后世社会批判诗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无论是四言诗还是五言诗，都以充沛的感情、质朴的语言和雄健的气势，写得生动劲健、苍凉激越，有着政治领袖人物的胸怀和气魄，表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正如敖陶孙《诗评》所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建安时期的文学开始向抒情化、个性化转化，曹操的诗是这个转化的表征。

三

曹丕（公元187——226），字子恒，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公元211）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太子，二十五年继曹操为魏王，随即废汉献帝刘协自立，改国号为魏，他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魏文帝。

曹丕在政治上比较平庸，不能与曹操相比。他执政七年，在统一国家的大业上无所成就，在其它方面也无重大建树。但是，他有文才，“好文学，以著述为务”（《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他在《典论·论文》中宣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在给王朗的书信里还说：“生有七尺之躯，死为一棺之土，惟有立德扬名，可以不

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曹丕把文学提到与事功相并的地位，把立德扬名、著书立说都看成是人生的不朽盛事。他以太子、帝王的身份如此强调文学，对鼓励文士去积极从事文学事业、活跃繁荣建安文坛、发展文学创作无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曹丕和邺下文人关系很是密切融洽。他们“行则连舆，止则接席”，诗酒酬唱，朝夕相处（见曹丕《与吴质书》）。可以说，当时邺下文人集团是以曹丕为中心，积极进行着著述与创作的。

另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的创作主张。本来，两汉的诗，质有余而文不足，建安初期还紧承汉风，在诗歌创作上并没有“刻意求工”，而是“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曹丕强调作家的个性和气质，注重艺术形式，崇尚文采，要求艺术价值，这便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促进了诗歌个性化、抒情性的转化，从此诗歌创作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表现出新的特点、新的倾向，为后来文人诗歌奠定了新的传统，这里面是有着曹丕的功绩的。

曹丕一生著述很多，有辞赋、诗歌，也有散文。现存诗篇，完整的约四十首，其中绝大多数是乐府诗。他的诗，语言清新自然，通俗明白，描写

细腻，感情真挚，表现出明显的抒情化、民歌化的特点。例如《杂诗》其二，写游子思乡之情，借浮云喻游子飘泊不定的人生遭遇，把游子流落异乡的惴惴不安的心情，表现得真切感人。其它如《杂诗》其一、《清河作》、《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出妻王氏作》、《善哉行》其二等等，都能用清新晓畅、形象生动的语言，真实感人地抒写出游子思妇和恋人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带有汉乐府民歌和古诗的明显影响。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燕歌行》二首，作为曹丕最著名的作品（其一尤为出色），全诗以一种如泣如诉的笔调，细致入微地刻划了秋夜思妇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同时，这首诗还是现存文人诗歌中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尽管它逐句押韵，形式还不够成熟，但为后来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曹丕诗歌的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无所不有。其中五言体最多，成就也较高，语言精美，气韵谐婉，在艺术上很成熟。他的七言诗体是一个创举，有开拓性意义。在他的许多杂言诗中，《大墙上蒿行》最有特点，全诗长达364字，句式有长有短，参差变化，灵活自由，对后来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